

华侨华人的故事 (中)

缅怀华侨抗日英烈周斌

在棉兰市创办了大地书店。书店开张后，以经营国内出版的普通书籍为名，并通过各种渠道进口了多种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宣传抗日的书刊，这里成为传播进步思想和开展交流活动的中心。那时，当地就出现“欺骗青年，假借文化美名，实行赚钱”而“不要上阴谋家的当”的流言，甚至国民党当局还传出“棉兰要被赤化了”的传言。于是，当地政府的政治部长就常常光顾此书店，弄得大地书店“鸡犬不宁”。尽管如此，他和赵洪品、陈季华几人，照样进行募款，并通过印度尼西亚《新报》社长洪渊源转寄给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去救护国内抗战受伤的将士。

赴陕北延安

1938年10月，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和连贯的介绍，周斌准备回国去陕北，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10月7日，他自苏岛起程，经英属槟榔屿、新加坡、香港，转广州湾入广西北上甘肃庆阳，最后抵达延安。因为有廖承志的介绍，很快，他便被安排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习。在抗大，他通过系统的学习抗战理论、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等课程，充实了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思想有了很大进步。12月，他在韩家村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

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并担任第18队第3小组组长，主要从事教育干事工作。由于他政治思想坚定，有很强的组织工作能力，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1939年1月29日，经戴文贤、林路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的“加入党的动机”一栏中，他写到：“我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故须先使社会进步，才能有个人的幸福，共产党为现世界上最前进而最正确之政党，故志愿加入，企在党的领导下，尽我个人的能力和责任，共求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

“抗大”学习期满后，他又主动向党组织提出派他回印度尼西亚工作。他说：“如在环境上许可，愿回荷属苏门答腊省，在华侨学生和其他群众中工作。我们中国人应该负起南洋殖民地的革命工作，虽那边的环境比国内恶劣，但华侨青年工人和学生的革命情绪是非常高的。”

1939年6月2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秘书长李大章写信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信中说：“抗大学生周斌同志，是正式党员，系过去由廖承志介绍来学习的，是南洋荷属华侨。现因他要求回南洋工作，已得抗大允许介绍给我们。现他已动身经西安、四川等回南洋。他的组织关系付上，恐无法转

去，惟他过香港时，还要找廖承志去，我想将他的关系打个电报给香港好了。”李富春接信后，于7月1日做出批示：“电小廖，发去组织关系。”并派周斌南下印度尼西亚从事组织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赴印度尼西亚苏岛

周斌第二次回到印度尼西亚苏岛棉兰市后，继续在火水山埠中华学校任教，并很快担任了校长。在该校期间，他积极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给初中部学生加开《政治经济学》课程。他白天在校上课，晚上还要为校外失学青年开办义务夜校。他知识渊博，历史知识丰富，讲课生动，书上一句话往往可引出一串串的历史故事，可说是博古通今，学生们都喜欢听他讲课。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凡有所求，无不竭诚接待和解答，深获广大华侨青年和学生的爱戴。学生牛子曾这样回忆他：“先生身材矮小，因为受胃病的纠缠，更把身子弄得孱弱不堪，但他那小小的眸子是发光的，嗓子是清亮的，文章和大字都很挺秀，象征着他的倔强的性格。”“除了率直坦白以外，就是满股的热诚，这热诚只暗藏在他的内心。他是个不善词令的人，但要说话时，他说得十分坚定的。”

周斌不仅传授学生文化知识，还向他们讲解许多革命道理。他

把许多禁书如《西行漫记》《论持久战》《星火燎原》等借给学生们阅读。他还经常给学生讲述中国革命中许多先烈英勇斗争的事迹，激发当地华侨青年和学生的爱国爱乡热忱。他还向学生们介绍火水山埠中华学校早期毕业的几位学生，宁愿抛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在抗战期间毅然返回祖国，投奔延安的事迹。

为了解决苏岛进步青年“精神食粮”的问题，周斌自延安返回途经香港时，就与当地进步书店接洽了有关进口进步书籍的事。回到火水山埠后，他与赵洪品等人商量，以招股集资办法，在大地书店后面的暗室里，建立了抗日书刊地下印刷所，周斌担任经理。

周斌还指导学生们一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筹集救济资金赈济祖国难民，筹募捐款支援八路军抗战。周斌分析了当地荷兰殖民当局对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会极力进行阻挠和破坏。他要求学生们要提高警惕，对一般华侨商人要多做说服工作，晓以大义；对少数唯利是图的顽固分子，要讲究策略，分别对待，尽可能团结大多数，共同对敌。学生们在周斌的指导下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他们将抵制日货宣传队分成小组，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当地华侨也很快掀起了一个抵制日货的小高潮。正如周斌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总结说：“抵制日货活动

之所以能开展得如此顺利，主要是华侨和祖国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我们华侨都懂得只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华侨的生存才有保障，

所以抵制日货支持祖国抗战的口号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广大华侨的响应，形成浩大的声势，汇成一股激流滚滚向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相继侵占印度尼西亚群岛。翌年3月，日军在苏北（今北苏门答腊省，简称“苏北”，战前称“苏东”）登陆后，长驱直入，很快便占领了首府棉兰。为显示其法西斯淫威，日军进入市区当天，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女皇街（今苏多莫街）与客家街交叉路口闹市野蛮地砍杀了5名过往的无辜华侨，将他们的首级置于路旁的砖堆上示众。这标志着日本法西斯血腥统治的开始，苏岛的形势趋于更加黑暗，陷入更为血腥、恐怖的统治中，来自国内的文化人和当地爱国华侨都迅速隐蔽起来。

苏北沦陷后，华侨深受日本法西斯血腥统治的祸害，更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意志。不久，周斌、赵洪品、熊辛克、林革尘、黄亚武和张谷和等开始筹划秘密抗日组织。同年6月，首先在棉兰成立苏岛人民抗敌会（后改为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接着又先后在先达和火水山成立抗敌会，周斌